

主題：「地緣政治與國家認同」座談會－成為「臺灣人」？

主講：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

與談：王健文、洪敬富、趙慶華、林奕志

時間：2020年8月28日（五）下午2：00 - 4：00

地點：成大奇美咖啡館（自強校區）

主辦單位：第二場座談比較接近研究會，希望大家自由討論。今天很感謝政治系的洪敬富老師、王健文老師、趙慶華老師、林奕志老師也都來了，把時間交給今天主持人王健文老師，謝謝。

王健文：今天是高格孚老師地緣政治與國家認同系列座談會的第二場，今天是高格孚老師做第二場座談開啟的主角，大概40分鐘。今天有與談人，一位是政治系的洪敬富老師，剛從成大的學務長卸任。另外一位與談人就是我本人，我們大概各12分鐘左右。接著我們會請台文館的趙慶華老師，跟政大社會所的博士候選人林奕志老師做簡單回應，再跟高老師初步的對話之後，開放大家做討論。

高格孚：上一次我們8/14見面的時候，我討論了第三代外省人王師先生，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他小時候享受的青田街「溫室」，怎麼慢慢碰觸之前他想不到的事實或思考一些之前沒辦法理解的不同立場，比如：「我是臺灣人，我不是中國人」的概念。再來，我簡短地介紹《牽阮的手》這個紀錄片對他是多麼大的震撼，我描述了他現場看影片起一個反應，他覺得他終於理解，外省人幾十年的時間忽略臺灣戰後的很多民主英雄的犧牲，他也出現「我們外省人當時站在歷史錯的一遍」這種想法，這是我們上次討論的部分。

接著，我們比較兩種做研究的方法，一個是量化研究，另一個是質性研究，我試著做的是，寫一個人的「生活史」，適合研究有特別意義的人，然後強調量化與質性研究兩者都有幫助跟差別。我們一直討論「代表性」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那次有種共識，就是生活史這種質性的研究所選的研究對象，他除了可以代表自己，還能代表人類、民眾、社會裡可能的的性、想法、作法等，跟量化研究樣本的代表性很不一樣。

最後，我們上一次介紹了訪問王師先生的作法，我描述了幾個重要點，怎麼選受訪者，怎麼選他生命裡重要、要研究的部分，還有怎麼進行訪問，怎麼整理逐字稿，怎麼寫一本「生活史」的書，這個又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事情。上一次演講的結論是提到共建效應（co-construction effect）以及「真實性」或「真偽性」的問題。王師先生看了這部電影之後，慢慢重新發現另一個臺灣，一個有多元社會的臺灣。他也重新再建構他的很多想法、概念，關於政治體制與價值、政黨遊戲規則、兩岸關係、政治上的利益團體等等。我們也談到他怎麼看「國家」、「祖國」、「族群」或「文化」等重要的一些概念。今天我們會關注王師所描述的「催化劑」，這是他用的字，就是他看電影之後，慢慢發生了變化，我們今天會進一步地理解後來的過程，催化劑怎麼樣影響他的一些想法。我這邊會加一些變數與轉捩點

。我們上次講了很多，除了這個轉捩點，還有其他因素，包括他做什麼樣的工作。其二，就是他去中國旅遊，其實就是去中國工作，他在中國發現了另一個事實。然後還有一個我會碰的議題，就是他的家庭關係，我會先談太太再談兒子，因為兒子現在還很年輕，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過，王師已經開始預測，現在就已經給他一個權利：自己選自己的認同。也就是以後的一個問題，也是地緣政治的問題，所以這個議題放在最後。等到兩岸關係、地緣政治，台灣特有的現象影響國家認同，所以今天這個轉捩點發生之後，怎樣影響王師先生的投票行為。

我第三次跟他見面，就是第一次做正式的訪問，發現他是個外省人，我們決定直接第二次見面討論受訪的方法，第三次才是正式受訪問。那一次就是我們第一次真的做訪問，就是跟我解釋到底那個投票行為是怎麼樣、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因時間的關係只講一些。他解釋為什麼他家人還有他的兄弟姐妹、他自己，有多年可能投給一個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他有個表妹從美國回來，投票給一個民進黨的候選人，他就嚇到。他自己也知道民進黨裡面也有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就是創辦人，也對民進黨陣營裡也有外省人這件事「讓我非常非常驚訝，我想說怎麼可能有這種事？這裡面的思路邏輯是怎麼一回事，當時沒辦法想清楚。」

當我問了「你什麼時候第一次投票給非國民黨候選人？」，他開始解釋他對國民黨有多麼不滿意的看法，舉連勝文的例子。我唸他這後面的看法唸一部份，他決定要投票給柯文哲，2015年做這個訪問，那時候柯文哲還沒轉成一個比較親中的。他其實不是真的算是民進黨，可是就意識型態來講，這已經算是很大的翻轉。他說「我相信如果說，去年國民黨推出的是丁守中，那我很可能會投給丁守中。」所以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轉變，是一個文化認同的轉變，就是一個很務實的看法，丁守中很符合我的價值觀，很像我希望的候選人。他說「所以去年國民黨推出連勝文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催化劑」、「我猜我弟弟和我妹妹都投給柯文哲」，很有趣，又是一個世代的問題。

「對我來講，連勝文的出線」，他代表連勝文已經不是從小到大會想投的那些候選人，他代表的是一個黨已經沒有能力推出好的候選人。最重要的，「一個黨已經完全被利益團體所把持」。他講的真的是非常尖銳，他覺得連勝文代表的是非常富有的人，他說「不管是合法或非法，他賺大量的兩岸紅利和財富」講得很直接，「然後他會作為未來對岸的代理人，繼續來壓榨。連勝文這個人被推出來，我感覺非常的憤怒，我感覺這個黨或這群人在欺負我爸爸媽媽，因為他們（就是國民黨）很清楚他們不管推出再爛的候選人，我爸爸媽媽都會投，所以他非常不高興，還講一句說：「憑什麼我們要這樣被您們欺負？」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所以其實這個點出他的轉捩點跟變化怎麼樣發生。不是像我上一次講的這麼簡單，看了一個紀錄片，突然意識就馬上轉變了。他發現他本來想法是錯的，然後慢慢去建構他的想法，當然沒有這個事是比較複雜的，因素比較多。我們今天開始加一個就是國民黨已經不代表他們中產階級的，甚至到沒有很多錢的外省籍的人。第二點就是，剛好差不多同一時間，他去中國一趟，也是重要的因素。他本來去工作，也去旅遊，主要是一個機會看見實際的中國，就是課本、國民黨教育，或是父母所描述的一個理念型的中國。剛好這兩件事情，就是看這部電影還有再去中國，是差不多同一個時間發生。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有沒有關聯或是相輔相成，他去中國這件事同時讓他發現中國，也同時再發現臺灣，因為他勢必有比較，我相信這是很多外省人體驗過的現象。

我再唸一些他那時候跟我講的事情「中國跟臺灣非常不一樣，非常非常不一樣。」他喜歡說非常，他說基本上就是「過去一百年來，臺灣跟中國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的，只有1945到1949年。」這個論述是典型的獨派看法，而從歷史角度來看，也不能否定，可是不是大家都會動員這樣的想法。我講歷史性，基本上會比這個說得更激烈，可是他引用一個以前只有左派的這些人用的概念，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再來他就描述兩岸的差別，他說「兩邊語言」，「兩邊語言、想法、習慣非常非常不同，我們對照之下真的會發覺說：民主真的是好的，真的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很多中國傳統中，好的和不好的，通通被淘乾淨。人在接觸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處於最不好的狀態，他

提到魯迅寫的很有名的書《阿Q正傳》，他說就是跟魯迅描述的中國一模一樣，「中國的劣根性和貪婪性一百年都沒有差別。」「臺灣這樣的生活方式代表文明、自由，對於個人有個最低限度的保障。」所以他分得非常清楚，結果他這段落最後一句，也是有趣。他說「我覺得有時候認同其實一邊是推，一邊是拉。我覺得這個推拉的過程，在我二十歲後，一直同時在發生。」他不是全黑全白或兩極化的轉變，因為他也幾次提到，不會拋棄他父母或者他的政治社會化、他自己的社會文化母體，他承認那些事他認同的一部分，所以他就不是一個基本教義派。所以今天第二點我想說的是，去中國，但是因為中國的事，讓他再看住在台灣的好處，會不會讓他變成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我們最後再講，愛台灣、認同台灣與台灣民族主義者，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至於第三個點是一個重要變數：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在國內行銷臺灣與國外的電影與紀錄片的公司，然後他因為職業的活動，常常去台灣各個地方，有很多機會、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我們做這訪問的時候，他提到有做一部電影。我記得第二次正式訪問，我還沒問問題前他已經開始講話。我的訪問的方法，是我少說話、讓他多講話。那次我們還沒點菜，他就立刻開始分享「今天想分享關於台灣認同與原住民...」。我覺得這樣真的是非常有遊戲規則，會讓我們想到，上次討論的一個問題，他是不是想傳達一個想法，或者他只是很喜歡跟我溝通？我上一次說我相信他某些方面利用我，而我也利用他，我們也是共生。

第二次受訪非常特別，我覺得還蠻有意義。大概就是講他以前一個同學，一個阿美族同學，大概是受我訪問，還有剛好那年準備做一部片《灣生回家》的行銷工作。所以他受訪問以及剛好準備這部片的行銷工作，這兩件事讓他想到過去有這個同學。他「現在」，就是他在講話的時間，就發現「當時」這個同學已經開始讓他開眼界，他已經在那時候，慢慢理解台灣實際上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只是沒有完理解。

這個訪問過程也是一個依據為什麼上一次要共建效應。我好像上一次也跟你們說了，我驚訝也很高興，可是也是嚇到我了。一次訪問後他跟我說「格孚，我們上一次見面後，我突然想到事情，我下次要跟你講。」意思是他回家之後我不在他對面的時候，他繼續想這件事情，這個訪問過程已經引起了這個過程，不能否定這是一個因素。關於原住民這個議題，他提到了一個還蠻不錯的例子，就是談一部紀錄片《唱歌吧！》，內容是一個南投鄉下的校長，帶小朋友唱歌，用這方式，給這些小朋友有一個責任感、參與感、自信，王師覺得很感動。

我們在外省人這個群族裡面，不管我們在哪裡，小群族裡面，我們不一定會看到多元化。他覺得這些事情讓他終於理解，台灣是一個豐富的社會，而且會給他一個機會，讓他看到可能是沒有被看到的人或弱者的聲音的想法，就是這些人讓他看到事實或一小部分。「不管是個人或影片觀看方式，讓我認識了與我非常不同光譜，另外一個族群的生命故事。我覺得對於所謂台灣認同的這件事情，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解與昇華，我會覺得台灣這麼小的一個海島，能夠有不同的族群跟文化菁英，不管早期從西班牙、荷蘭、日本、美國等等，或台灣自己本土的，有外省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新住民等等，我覺得這是珍貴的，這個珍貴會讓我進一步覺得，能夠在這個地方，享受這個多元的自由，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我選了這一句是因為我訪問他六次，下禮拜會是第七次，他幾乎每次提到這個社會多元文化與民主體制的可貴。如果這不是要傳達一個想法，至少他要解放自己，說出一個他覺得不被重視的一個點子，他一直提到這問題。

在這方面，多講一個小小的議題，我問他他會不會講台語，他說不會，我問他在工作上會不會是障礙？他的答案蠻值得一聽。他說「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講台語是最自在的，因為有

很多在工作上遇到老一輩的前輩，對他來說，講台語是自在的，而且表達最豐富的一種語言。如果我沒有辦法聽得懂，其實只能立刻跟他說：『對不起，我聽不懂。』然後他會覺得他這樣的回答，對方就被迫要轉成國語來跟他講話，他覺得可惜，因為那可能就不是他最熟悉、最豐富的表達的事。所以他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他失去了、不能掌握的事情，這其實很可惜。

他的工作，他去中國，我們剛剛看到是很大的因素，使他慢慢改變。我選擇把他投票行為的變化放在前面，因為實際上我不知道哪個是前哪個是後。這個變化，就是我講的，一起發生的。所以他的投票行為的變化，是一個結果，也是一樣繼續變化，也是部分因素。而且這個投票行為變化對他來講，也是一種冒險、挑戰。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柯P後來變得不像他本來以為的政治人物。我們那時候還沒到總統大選，還記得我們上一次所訂的時間，是一定要在總統大選前結束，這樣才不會被影響，他那時候已經決定了。我問他你明年會投票給小英？他說應該會，後來我就去找他繼續聊第二個系列的訪問。所以這個投票行為也在改變，不能說是一個變數。

我最後想加的一個變數就是家庭關係，他的父母是台灣外省人第二代，所以他們受到的教育影響，難怪他們比較偏中國思想，或是國民黨傳統的看法，他們現在是比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解釋，這是從他的爸媽開始，他爸爸在大陸待了幾個月去幫一個親戚，然後再回去南京，覺得還蠻不錯，這個城市蠻發達的，中國的金融有很大的進步。回來臺灣後，我引用王師的話：「我爸爸回到臺灣，覺得臺灣小鼻子小眼睛，中國才是一個大國的風範。王師的爸爸其實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強烈的認同感，他會覺得在中國共產黨主政下的現在這個中國，才是強盛的、統一的，從清朝衰敗的那個中國中再度起來的中國。」

我問了他的媽媽的看法怎樣？他的媽媽完全不會碰台灣認同的問題，主要是她完全不要看、完全不要談看這個部分。「我媽媽就覺得臺灣完全不應該有，也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也說基本上我媽媽就比較不看政治，也沒興趣。我們也會看他跟太太討論政治時，會發現一樣的情況。你們如果有參加去年的國際會議，我記得張茂桂評論我的時候，跟我說我應該去問王師的妻子的政治趨向，來研究看看有沒有影響他，所以我就做了。今年三月我來台灣一個禮拜，我順便去訪問了他，以前我是不要碰這個問題，可是我被張茂桂說服了，所以我就問他。他的岳父是外省人、高雄人，是韓粉，他的岳母是台灣人、本省人，不過不能說是本省人，因為我們就已經不算是一個省了，這個語言上的問題我們一直都在討論，有時候我會說非外省籍台灣人。因為我也不想說外省人、台灣人。無論如何，他的岳母是所謂的本省人。然後我問他那你太太有這樣一個家庭背景，他投票行為是什麼？他說「我太太投票應該是偏藍的，我猜。」很有趣，他們沒有溝通到，他只能猜。可是如果他們沒有溝通，為什麼？是因為他大概知道他的岳父是韓粉。

他回答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我們上一次討論的「真實」議題，他是不是確切地這樣發生？他是不是把一個很長的故事講比較多？或比較簡單？因為剛剛講的有點矛盾，用猜的，他又說「我跟我太太不談政治，偶爾可能會稍微很少很少的談到」，他覺得他太太看政治的時候，其實不是看政治的辯論，是看比較實際的節目，這是不是一個男生對女生的刻板印象？我這裡就不講了，因為我沒有去研究這議題。基本上他太太是看教育、孩子的健康等等這些比較實際、生活有關的節目。我想問他，真的會完全影響嗎？我就問這個：「你會覺得有受到她的影響？還是她受到你的影響？還是你們互相影響？」，他回答「不互相影響。」，我再問「是為了避免互相影響而不談，還是因為覺得沒有必要？」，他回答「其實影響不了，講多，可能也會有衝突。」

所以這個很奇怪，影響不了的意思是說，他很硬，我很硬，我有我的看法，他有他的，他絕對不會影響我。可是如果他真的知道這些，那就是他們已經溝通了，他不用猜，他就知道。如果是影響不了，那就不必說，可能會有衝突，因為他已經知道有很大的差別。我這邊要說的不是笑他或講他說謊。很多人會發生這樣情況，可能先生是台灣人、外省人，太太是非外省的台灣人，或是相反。他們認識的時候，至少一兩次碰到政治或參加文化活動。在很多年前，大概 2004 年認識的，就是台灣人在講文化認同辯論最激烈的時刻，男的是台灣人，非常支持阿扁，女的是外省人，非常討厭阿扁，他們在我面前，然後我開始談二二八，這件事情我還有感覺，他們就因透過我而發現他們的看法多麼地不同，多麼地沒有辦法溝通。如果我不在，如果他們不是夫妻，他們可能會吵架，就是不一樣到完全無法溝通，很兩極化的看法。就是說二二八的受害者就是台灣人，no，受害者就是外省人，這麼簡單，這麼兩極化的對話。這個很普通、很常發生，所以就不用碰這個議題。

所以謝謝張茂桂老師建議我的研究，可是好像是不容易。可是，因為你們知道王師講的邏輯很有架構，他講得很清楚、很直接，有時候會讓人覺得他講的好像是一個學者在寫書，沒有錯字，講得很細，用的專有名詞很多。我聽的時候學到很多，所以我覺得他可能真的是這樣，完全不會讓他太太影響他。可是實際上有可能，就是多多少少在生活中有點機會談論一些議題，然後發表意見。

我的結論就是，像上一次我試著描述王師的認同模式，是建構、社會改變的、是多元的。我想了一個概念就是「務實主義」。

王健文：接下來先對高老師的講座簡單回應，我想要先再請較高老師幾個簡單的細節，第一個就是王師第一次到中國旅行或者是工作是在哪裡。

高格孚：還沒有說清楚，而且我後來也沒有再追問，就是為什麼剛剛我說，什麼時候的原因或結果。

王健文：第二個就是他，因為我沒有再複習上次會議的那篇文章。

高格孚：應該是他看了這部紀錄片不久之後，大概是幾個月之後，紀錄片是 2010-2011。

王健文：沒關係這個我可以再確認，剛只是有點好奇。再來是，高老師去年的文章寫說他是眷村子弟嗎？應該不是吧，他住青田街，青田街是天龍國裡面的天龍，所以他的祖父母是軍籍的。

高格孚：青田街的確是青龍人

王健文：因為他又是金華國中、師大附中、台大。22 歲之前的生活圈都在一個最小的、最集中的，全台灣最大的一個區域。也許他祖父母有軍籍，他的父母第二代或許曾經在眷村成長，但到第三代，他成長的環境大概已經跟眷村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想眷村的背景大概是用來理解他的父母，而不是王師。那這個是我好奇的幾個細節。洪老師是做過中國研究、兩岸研究的重要研究者，所以剛剛洪老師的回應非常學術、專業。但我可能是比較個人生活經驗、小歷史的部分，作為一個也是歷史當事人之一，來說一些我一些簡單的想法。

剛剛一邊聽高老師演講的時候，一邊做簡單的筆記。剛剛講到中國旅行，這很有趣，不知道王師是哪一年去？他去的時候看到的中國是貧窮、落後的狀態，如果在 2010 年以後去，大概這些元素都還存在，可是可能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我很同意剛才高老師所說的，很多外省，不管一代二代三代，第一次的中國之旅，在發現一個新的現實中國的同時，他在那個時候，用比較關鍵性的與另一個方式來認識、發現台灣，也就是說，發現現實中國跟發現當下的台灣常常是在同時發生，而且常常是在中國旅行發生。

我個人在 1990 年時，我第一次陪同我父母到他們福建的老家去訪鄉探親，我完全經歷這樣的過程，我回來之後寫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引用我父親跟那邊一個親戚晚輩的談話。我父親當時回應晚輩的說法是，他說台灣是他的第一故鄉，他小時候成長的老家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小時候曾經去唸書的另外一個村子是他的第三故鄉。我父親有一次去探訪他自己小時候唸書的地方，那個親戚晚輩就說，那這是你第二個故鄉，他指的第一故鄉是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但我父親他就說台灣才是第一故鄉，後來我把這個故事寫成短短的文字，我覺得那件事，對我來講，是當下蠻打動我的一件事情。然後我本人其實也是在那一過程當中，我覺得我的台灣意識、本土意識，其實在那時候會特別地清晰起來。當然歷史是在流動當中，我本身是在學歷史的，1990 年的中國跟 2010 的中國跟 2020，或未來可能 2050 年的中國，當然會是不一樣的，歷史是不斷在流動當中。所以我剛會好奇就是，王師第一次到中國是哪一年，因為早十年、晚十年去，看到的可能是不太一樣的中國。

第二個我感到興趣的是語言，王師不會說台語，其實是台北人很常見的。我大學時代很多台北的女同學是很顯然，或者說用高老師的定義是「非外省籍的台灣人」，其實很多人不太會講台語。我相信我的台語講得比蔡英文稍微好一點，我父母親都是外省人，我是外省第二代，但我不是住在眷村。我父親是一個小公務員，所以我父親分配的宿舍是散在一群本省人的社群當中，有客家人、福佬人，以及我小時候在花蓮長大。所以我們經常會遇到同學、朋友，或街上會碰到原住民。所以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很困惑，有時候我想要問我母親，她可能已經 90 幾歲講不清楚了，我的母語到底是什麼？我只記得從小我父母親講的是福州話，他們會對我講福州話，可是我在街上跟鄰居小孩是講台語，然後我父母親用福州話跟我說話的時候，我會用台語回他。一直到現在我打電話回家給我媽媽，他講福州話，我講台語，因為國語是我媽比較不熟悉的語言。其實我從小是講台語長大的，但我父母親都是外省一代。所以，你熟悉不熟悉在地主流多數人使用的語言，那其實會是蠻重要的。我覺得在一個人認同形成過程當中，當你熟悉一個語言的時候，它會解交不少可能的阻力，或者說讓你有機會去跟另外不同背景、族群的人，有機會比較親近或者互動。

剛講到說，王師從小在青田街長大，然後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大概都沒有離開他家三公里以外，都在三公里以內非常小的圈子，他不會講台語。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去知道的背景，這樣的背景跟他後來的改變，我覺得做這樣兩個不同時間軸，不同的生活環境、出身背景之間的對比，可能會更有意思。

另外，王師 2014 年的選舉投票行為當中，其實也看到有趣的東西。剛高老師也提到，我們不能以 2014 年跟六年前的政治選擇，就當作他未來這六年的選擇，他可能改變，改變會是什麼？我不曉得高老師有沒有問過他說你現在對柯文哲看法是怎樣。但是如果 2014 年來講，王師自己說如果國民黨推的是丁守中，他會投丁守中，不會投柯文哲，因為如果推丁守中，就不是連勝文出來。我們都了解就是，丁守中在國家認同方面，他的政治光譜比起柯文哲是更往中國認同這一邊，也就是說 2014 年王師那一次的政治選擇，他的投票行為其實並不是在中國認同跟台灣認同之間的選擇，而是一個，比方說他談到階級的問題、左右的問

題。他對國民黨推出一個富豪之家，這個富豪可能有不當政治利益的嫌疑，唯一跟中國認同、台灣認同有關係的是，他懷疑他的政治利益跟經濟利益會跟中國之間有各種勾結，這是王師當時的判斷。也就是說 2014 年政治選擇的改變，王師其實並不是以民族認同作為軸線來做決定，同樣這也不意味著說他後來就不再如此。這個要看高老師跟他的訪談當中所瞭解到的 2014 年以後一直到今天，因為我們又經歷了不同的政治事件，他的改變是什麼，或他又發展出新的東西？

我們也看到王師的國家認同，從政治來講，認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他認同這樣的自由開放多元的民主生活方式，他不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極權的體制，他覺得台灣的自由開放、包容遠比現在的中國，更是他想要選擇的。但是王師做這樣的政治認同選擇的同時，並沒有在文化否定中國歷史的文化。我記得上次有位朋友談到國家認同跟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高老師似乎很快就否定，覺得文化認同不太需要談。可是我覺得就王師的例子來講，他在文化認同跟國家認同方面並不是一個簡單、一致化的東西。

我最後回到我自己來做一個簡單的結束。作為一個外省二代，我的父親是小公務員，不是軍人子弟，就是在眷村長大。我是學歷史的，我的歷史專業是中國先秦思想史，我對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有非常深刻的情感跟認同。但政治認同方面、政治選擇的方面，我覺得對我來講毫無疑義，三十年前我的同學都說我是台獨，我一直覺得台灣應該在政治上要獨立於中國之外，即便中國民主化，我都會覺得台灣還是要獨立比較好，因為我覺得世界上除了美國稍微像樣以外，所有的大國都很困難，更何況是極權的國家，即便它民主化，它也有很多很困難的挑戰需要去克服。我其實從學生時代開始，就覺得政治上很容易獨立，而這個獨立的國家要叫做台灣共和國還是要叫中華民國，我都沒有意見。但，同時我務實地覺得，如果邁向這樣的政治目標，我們必須是一個比較理解的態度來進行。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或知識份子，其實要很清楚地了解到，當我們走向某一個目標時，他會不會帶來一些可能的災難性後果？這當然各黨有各黨的評估，也就是說，你怎麼樣讓台灣在不陷落於災難的可能下，走向我們都期待的美好的未來？這當然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我想要說的是，國家認同，若這個國家認同指的是政治認同的話，有時候跟文化認同的確會是不一致的，是兩條不同的軸線，而且不互相衝突。我可以熱愛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同樣我可以支持台灣獨立，我覺得台灣應該是自己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如果它叫中華民國，我也很開心，但是它不叫中華民國，只要是大家都決定往這個方向，而且不會有什麼強大負面後果的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順著我們社會最多的人心的主流來走。最後我用個人例子來提到說，國家認同跟文化認同，我覺得還是需要擺在一起談，而且很多時候，比方說我對獨派有很多批評的時候，我可能並不是反對他們要建立起一個政治的獨立國家，而是我反對他們在文化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清洗，或者是一個絕對污名化、負面除名的態度。

趙慶華：謝謝王老師也謝謝高老師，也謝謝成大人社中心的邀請。我很多想法、想提的東西，剛好王老師也都有提到。在主辦單位原本設定的主題，有個小小的子題叫做成為台灣人，也就是說透過王師的生活史、生命史的變化，高老師今天給的標題是「震撼、轉捩點與變化」，在生命經歷這樣的過程後，成為所謂的台灣人這樣的敘事。其實我看完這次高老師提供的這篇文本之後，反而有一些之前不會有的感覺，第一個就是說，所謂的台灣人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名詞，就是說當我們再說成為台灣人的時候，到底是哪些方面成為了台灣人，或者是要成為什麼樣的台灣人？

就王師的例子，比方說他裡面有講，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就是台灣人，這很明顯是土地認同，指這個土地、生長的环境。但在王師的故事裡也看到，他對政權、血緣、文化、語言，我們不知道王師是不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對台獨的想法，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他在最後的結尾談政治，可是這個政治不是國族，是政權，統治者的那個，他說：「我不要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因為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底下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這個裡面講出來的是這個，那沒有講的是什麼？在文化上來說，他其實還是很認同文化中國的遺產。在生活上來說，就是高老師說的，所謂用務實角度來講，在台灣的生活是環保的、乾淨的、文明的。我們在談成為台灣人這件事的時候，其實很複雜，它是一個複數的概念，沒有單一、本質性的「台灣人就是什麼」，事實上在不同的面相大家會有不同的選擇。

再來就是說，就王師的故事、經驗來說，我看完就會覺得，跟他差不多時代，或比他再大的，他是 1978，我跟他是所謂的六年級生，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解嚴、本土化、民主化。小時候接受的是黨國教育，經過解嚴看到台灣整個本土化的發展，這剛剛洪老師也有講到，內外緣的政治社會化交互影響的過程。我就覺得王師的例子好像也沒那麼特別，很多在黨國體制底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都可能經歷過所謂「再發現台灣」，或是認識實際上的中國。過去是地理上、文化上、概念上的中國，終於到我們說的兩岸開始有交流以後，我們就有機會認識實體的中國，就會發現跟教科書講的完全不一樣。然後，在這過程裡面，因為外在社會在變化，我們也會有機會再去發現自己親身經歷、生長的台灣，不管是透過旅行、閱讀或什麼。所以我就覺得那好像大部分這個階段，或某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就是有這樣子的經驗。

高老師在撰寫王師的生活史，然後去談它認同轉變，我會有兩個小的建議。因為在這篇文章裡提到了，比如說，對他認同，至少目前看來，他覺得最大轉捩點是《牽阮的手》紀錄片。但事實上他去中國旅行，如果他可能是在一二十年前，還有他如果因為工作的關係擴大他去認識台灣的機會，這也可能是在 2011 年前，然後，也包括 2014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我覺得影響他的好像有這些變化，還有他後來結婚生子，這些因素都不斷地交互在影響。因為這個時序目前看起來是不清楚的，可是這些事件有可能冥冥之中互相發生影響，去影響他某些意識的變化或轉變。所以，我會想要知道說，哪件事情是哪個時間，比方說，剛王老師也問到中國旅遊是什麼時間，他工作上擴展他對台灣的視野是什麼時間，他看了很多跟台灣有關的影片等等，也許可能需要盡可能去做一個他生命史的年表，那這個生命史個人的小趣事，小歷史的年表，再去對照、參照台灣，甚至中國兩岸之間的關係。這個表出來，我覺得在分析上或闡述上會更有深度的去釐清或發現。

林奕志：謝謝大家、前面老師們的分享，特別是王老師跟洪老師都有提到我同樣有觀察到。謝謝高老師，因為我覺得高老師用這麼細緻的方式來讓王師的想法表達出來的，這確實很少見，這在其他不管是學術或非學術都很少談到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有很多細緻的東西可以討論，這樣材料會變得很豐富，不像是過去我們常接觸到的大數據，或是統計表這類型的東西。

我的領域主要是經社會學，經社會學通常在討論說，像是經濟的基礎或政治文化社會交錯互相影響。對我來說，延續上次，而且剛王老師有提到的，我還是非常好奇的部分，王師在 2014 年的投票選擇，他其實比較是經濟上的選擇，而不一定是國家認同或文化認同上面的。至少我們看到這段發言是很清楚的，他主要是經濟考量來做這投票，當然投票行為並不完全代表他當時的發言，但是他既然已經這樣表達了，我們就不經會去想說，如果當時國民黨真的提出丁守中，因為一直以來社會學內有一個對教育的論述是說，國民黨雖然在一開始的狀

態有個很明確的一個階級性，就是說他佔據社會資源中主要的位置並延續它，這個延續過程當中，它階級複製的過程並沒有很強，但，這沒有很強的其中之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是公務體系作為延續的過程，這公務體系有一定的開放性，沒有那麼容易就指定誰是他的接班人。所以在這過程當中，外省階級在經濟上的階級性開始鬆動，他可能像說，更少人能獲得階級複製的成果。在這角度上面來講，就有點符合王師的看法，可能國民黨特選階級更加內縮、變更小一塊，像是連勝文這批人。但即便是過去認同跟他接近的一批外省人，他們已經分享不到這批相對可口的經濟果實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它影響他不少的認同。反過來意思是說，國民黨如果還有辦法，在政治的時候，還有辦法保障他的階級意義的話，會不會他的投票行為會更保守一點？就是說，他可能不會在那時候投柯文哲，就是在這部分的經濟決定有多強。那在這方面我同時想到的部分是他的父母輩，可能是第一代，或是稍微早一點的外省人，他們過去被黨國教育，他們非常反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有提到改革開放的交錯，中國硬實力起來之後，這群人本來應該是最反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他們現在的認同卻很多變成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過程當中，實際上他們都是認同中華文化的，可是他們國家認同卻有點轉變了，我在想其中所謂的硬實力。硬實力主要談的就是經濟實力，這裡面決定的因素有多少。這是我第一個想要嘗試切入的，因為經濟的問題在這邊比較少提到。

如果要談經濟的話，我還有一個比較好奇的問題。比如，最近像是…這個既是經濟也是文化，愛奇藝的爭議我不知道高老師清不清楚，它其實是經濟也是文化，因為它跟王師的職業有直接相關，王師他可能會有許多生意來自愛奇藝，但愛奇藝因為台灣的政治因素被禁止之後，我不太確定他會是怎麼樣去想的。不過愛奇藝的部分就比較複雜，有機會可以再討論。

我想談的另一個部分是說，剛剛洪老師有提到，這也有一點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初見這個問題，有點想對於這問題提問，其實也有點像剛趙老師提到的就是說。王師這個人他的認同改變。在台灣，有那麼特別嗎？因為王師他很顯然過去…至少成長的團體是以外省人、眷村，我想他周遭應該主要還是外省人，那氛圍還是比較強。他在當時的主流認同就是那樣，他認同當時的主流。轉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到現在，到他改變投票行為的那個時間點，台灣的主要認同已經很明顯地轉變了。他的轉變的原因，到底是如他所說的那樣子，還是其實本身就是大的社會結構，不管是經濟上面、文化上面、認同上面的改變。我們比較想問，他的這個轉變是因還是一個果，但這個事情是我們沒辦法確認的，但是我想大家都有觀察出來，比較會指認說，王師他的轉變其實並不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怎麼去指認或者去談王師他轉變這件事，或甚至他的轉變是否真的是轉變？王師人不在這裡，我覺得還是可以講直接點，他其實是個主流認同的，他其實認同這個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主流文化，現在這個主流文化有了調整，他也因此跟隨著調整，我覺得這不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怎麼去想這件事，或者高老師怎麼想這件事，是我蠻想要知道的。

高格孚：謝謝你們的建議，你們帶來一些新的想法、評論還有批評。今天像上次一樣，真的很豐富，有很多事情我只能講一小部分。順使用這個機會跟你們說，我們上一次辯論，已經做了一個逐字稿正在編輯。所以希望你們上次的與談人，也去看一下如果有人要修改或進一步解釋，或改變一些部分，歡迎。

我想關於王老師提的時間的概念，他什麼時候去中國，他的確沒有講得很清楚，而且他講得很模糊，因為我記得有一段時間，他當下，不久之後剛好又發生一些事情，或有另外一個，就剛好同時。可是他也說了十幾、二十年前，那 2015 年的十幾、二十年前就是 2000 年初，大概是阿扁上台之後。可是還有另外一個部分，他提到鄭南榕自焚不久之後他去中國，因為

這是 1989，1989 到 2000 年有 11 年，所以有點問題，如果他 1978 年出生，大概不可能 1990 年左右自己一個人去工作。

林奕志：有沒有可能他陪他爸爸？

高格孚：不，他說他去工作。他有沒有去兩次，我不確定，可是他談的那一次真的是，他第一次去中國，後來他可能有回去了，可是那一次是他第一次一個人去工作，而且是他爸爸媽媽去那邊過幾個月之後。這個我回去查一下。我不是懷疑他是不是講實話，只是我們上次提到的部分就是說，就是把一個很複雜的故事弄得比較簡單、比較有方向，這也是寫生活史的另外一個問題，共建效應一樣的問題。儘管你的建議是非常有趣，我必須做這年表，因為我們可以做個對照、比較以下，他的變化跟社會的變化，還有我想中國的變化，甚至是國際的，再加上我就可以看他有沒有做所謂的線性。

謝謝王老師提的這些想法。對我們來講，我們做台灣研究就覺得是這麼地 evidence，我不用提當時的民主自由、言論自由的發展是怎樣的情況，可是老師都知道，我們一定要講，要不然讀者可能會少一個很重要的脈絡，這一點我一定會講得比較清楚。雖然我準備要寫的書是中文，讀者是台灣人，應該是都清楚。不過三年前我去東吳大學政治系，聽到有一位 18 歲學生，三年前跟我說，李登輝，這位他不知道是誰。我還是會覺得可能會有些讀者不知道，所以我覺得講這個脈絡應該是很重要。

慶華你問的關於他是不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這個問題，如果我沒有誤會，你說我們還不知道。實際上我們已經有蠻多答案，有很多小小的細節，還是看你怎麼詮釋。我講一些，我這次的演講稿，沒有唸的一小部分，就剛好回答你的問題。他談到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是誰，我的認同是什麼？給自己一個認同表現的時候，我會分成從要討論是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不同面向。他有次講的跟一個學者很像，推論的概念非常有趣，他說從政治方面就很簡單「我絕對不會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個國家、政府、政黨做得太爛太糟糕，我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我就不想做這的公民。可是他談到文化，他覺得受到這個教育，而且中華文化、中國歷史，都有可以認同很棒的部分。這個我不排除，我不拋棄，我就留著，我覺得這是很清楚的部分。在這裡就剛好畫一個界線，就說我非常愛台灣、認同台灣，在其他地方他就講很清楚，台灣是我的祖國，我已經幾次、以前就有跟你們說了，所以台灣是你的祖國嗎？答案：真祖國。就這麼簡單。

可是你看「從文化上來講，我不會像某些台灣基本教義派，會想要製作台灣的文字或是完全使用台語過生活。這些很極端的對我來說，那不方便，而且太 radical，在生活上來講…」他劃分界線，這有點太過分了，因為他提到了一些在成大也很熟悉的，不需要多解釋，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把這問題弄得一點簡單，從這個論點我們可以看，其實他不會太偏向於民族主義的看法，或比較基本教義派的看法。不過我們也不能懷疑他很認同台灣。這裡我們有個答案，我試著講。他是一個典型的個案，他很清楚地分文化認同跟公民認同。從文化方面，他是多元，他承認、他接受多元化，可是從政治的認同來講，他只是一邊的國民，所以他覺得兩個可以分，的確是基本教義派的人不太會做的，可是基本教義派跟民族主義者又不是一樣的，你可以當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然後承認中華文化也是我文化的一部分，這沒有衝突的。可是有些人他們會說我不接受，我跟中國沒有關係，只要看「中華」兩個字我就有反感，那就算基本教義派，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們已經開始有這兩次的辯論。我們已經有些小部分，可是就是留到最後，剛好是第三場的主題。

你們知道有哪一個老師，他在研究這個台灣認同的時候，他問了一個還蠻突破性的問題。他問：我們怎樣形容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他的點子是很簡單、很中立、非常的有用，而且他一提這個點子，大家都覺得：「對啊，當然是這樣」。所以這個點子是什麼？當你面對一個恐嚇台灣的中國，當你面對一個這麼惡劣的共產黨(這是我的看法)，你如果只是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而已，很難評估你是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是如果你問受訪者一個不一樣的問題，問假設有一天，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然後停止恐嚇台灣，你的看法會不會改變？如果受訪者說不會，那就可以算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是當然也是要討論的。因為你現在問，不知道到時如果真正的發生，對方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實際上 1997 年，我做了第一波的問卷調查，我第一次發問卷調查表。我就實際上問這個問題，我沒有這麼理論性，做這個我就發現，我可以評估到底有多少外省人，一代二代，真正的認同台灣，到底有幾%？真正的，不管怎樣就是願意放棄中華民國的國旗，不用繼續享受民主社會的好處，就讓中國打來，就比較好，因為李登輝真的是壞蛋。像有一次一個受訪者跟我說，中共可以打，我歡迎他們。所以我那時候也有一樣的想法。關於這個生活史，就從一些方面比較複雜，從一些方面比較簡單，所以我繼續問這個問題，看他最後他是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的確不是基本教義派，我自己也認為他不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為什麼呢？就是一個暫時的結論，因為王師這個人就是務實主義。然後下一次我們會談的是，如果中國打來，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怎麼看這件事，他會怎麼樣地處理，他有太太、工作、小孩，所以我想我可以再追問。

還有林先生你問的，關於丁守中這件事，我還是一樣沒辦法回答這麼複雜的問題，我會試著找個方式，下次回答比較完整。只講一個簡單的 idea，丁守中沒有被選當候選人是一個事實，也不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可是我還是覺得是一個歷史的趨向。雖然你問的問題我也很想問，但他沒有被提名就是個事實，所以我做這個生活史不能做，你想像一個沒有發生的將來，然後重新再思考，如果希特勒畢業了，他不需要找其他獨裁者的這種工作，他就會乖乖地當藝術老師，世界的歷史會怎樣？這個是對我們一些學者也很有趣，可是實際上不會落入想這問題然後試著回答，還有沒有重要的問題？

觀眾 A：我想問國家認同我想到，是在法國的一個他們的狀況。我想要問高格孚老師，就是亞爾薩斯 Alsace 跟洛林 Lorraine，他們在德國跟法國之間，之前他們就是換來換去的問題。這個地方是不是也會有國家認同，會有這樣的狀況，他們是怎麼去看待？他們的社會有怎樣的一個界線？

觀眾 B：我本身是成大的專科醫師訓練出來的，背景是學醫的，我本身是在眷村長大，我也從事藝術創作。前陣子就是幫文化局，我有紀錄一些眷村的影像，有在文化局中展覽，但我發現到，我現在去搜尋眷村文化一些群族裡面，他們隸屬比較光譜另外一端的基本教義派，他們認為日本的那一塊就不適合在我們群族裡滲透。可是我就覺得很納悶，應該是要用開放的態度，日本人留下來的眷村，應該是要有一定的脈絡才能開始到現在的。但是他們只提到說國民黨來以後，不接受其他的。我是比較取向開放的一派，希望把歷史完整地呈現，這中間就是一個國族認同的差異，看你用什麼樣的態度。

我對老師這個題目非常有興趣，自己心中也有個疑問，想要去釐清，剛剛有提到，我是學理工的，比較不容易被改變自己原來的認同方式。我有機會聽到這樣的演講，也有個人的生活史，去抽絲剝繭出來的認同的游移狀態怎樣的改變，我是來做學習的，謝謝。

王健文：時間關係。就請高老師做回應，大概六分鐘。

高格孚：我大概一分鐘以內（笑），你的問題最好是要問法國歷史專家，因為我們學者不喜歡隨便講我們不理解的。說實話我不是逃避，或是繞過這個問題，我不是專家，我不敢回答，我可能只是有一個簡單的概念。很難比較兩個不同的情況，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認同方面問題，可能比台灣、中國關係複雜。可是很有趣的是這個問題解決了，法國跟德國不會為了這個亞爾塞斯-洛林的問題開戰，所以解決了。可是那個解決的過程，法國史、德國史一些有趣的事情沒辦法幫我們理解、解決台海的問題，因為脈絡完全不一樣，政治文化完全不一樣。我們可以另外談，如果你想要聽的話。然後你的問題，對不起我沒有真正聽懂。

觀眾 B：我沒有問問題，我來這邊做學習的。

高格孚：我以為我沒有聽懂。

觀眾 B：我上一次上完課之後，我回去又做一篇，因為我是做影像創作的，這是我小時候在眷村的幼稚園裡面。

高格孚：我可以拍你的一張照片嗎？

觀眾 B：我把這個照片做了一個創作。

高格孚：我的目的是不是看這個照片，就是看你在現場介紹。

觀眾 B：上次老師有提到國族認同，我回去就把我幼稚園的畢業照做了一個藝術創作，因為那個時候不了解我是什麼認同，就很天真，不會想到。我就用比較感性的方式，用比較天真、無憂無慮的方式去表現。實際上有些裡面，可能有媽媽是本省人，或是爸媽都是本省人，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用色塊去表達基因上的不同，但這裡面沒有理性，只是感性的，我自己就是藍色的一塊。

高格孚：就是不見得一個臉…。

觀眾 B：用小孩塗鴉的這種感性，不是刻意要去做區別什麼的，藍色就一小塊，他有點模糊，這是初步的，我後來又有重新創作。

高格孚：你後來有發現當時不知道的差異的文化跟認同，後來是成人的時候才發現？對你來講是一個比較負面的遺憾的地方？或是是一個正面的，長大之後，多理解，實際上以前在這個小學有很多不一樣背景的同學。所以是從一個正面還是負面的抒發來做？

觀眾 B：我希望找到自己的自我認同。我自己母親是平埔族人，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是。我後來去找歷史，找父母親日治時代的戶口名簿，才發現他也是。他就不承認，祖先跟他講他是福建人，可是我找到證據。1910年他們的村莊有日本人類學家去做調查，他們那邊80%都是平埔族人，而且他又是姓潘，早期賜的姓，但他到現在還是不承認，他已經被漢化。

高格孚：其實都是同樣的問題，不承認。

觀眾 B：對，他是被漢化了，所以很有趣，激起了我想要去一連串的不同創作方式。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